

立足丝路农业传播,面向世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学术研讨会:2017PNJCCS 论坛会议综述

徐定懿 张洪玉 张寅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7)06-0139-07

2017年10月21-22日,“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学术研讨会:2017PNJCCS(Purdue University-Nan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会议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新华报业集团主办;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承办;《中国农史》杂志社、乡村文化保护与发展志愿者协会、江苏爱能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协办。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山东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普渡大学、剑桥大学、俄勒冈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40多家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00余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10月21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教授主持开幕式,出席本次大会开幕式的嘉宾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原副会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江苏省社科联主席刘德海、江苏省住建厅副厅长唐世海、新华报业集团副社长庄传伟、北京光华设计基金会理事长张琦、中国科学院闵庆文研究员、美国普渡大学赫特教授(R. Douglas Hurt)等。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董维春教授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赫特教授以“绿色革命在中国”为题,做了关于转基因食品的主题演讲。转基因食品不但涉及粮食安全和人类健康,还关涉国家进出口贸易,有现实的经济意义。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做了关于农业遗产保护的主题报告。报告列举了各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例,并结合他多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

本次论坛以“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为主题,从历史学、人类学、地质科学、环境科学、水利科学、植物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角度展开讨论。根据大会主题,讨论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及农业文化传播;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交流与比较研究;地理环境、气候与粮食问题及对亚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

一、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及农业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

【收稿日期】2017-1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研究”(16AZS005);南京农业大学2017年度中央高校人文社科基金育才项目“西汉丝绸之路农业交流研究”(SKYC2017013)

【作者简介】徐定懿(1983-),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张洪玉(1991-),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技术史博士研究生;
张寅(1987-),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科学技术史硕士研究生。

称。由此,丝绸之路也就意味着古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与交流之路。本次论坛以“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为主题,正是体现了中国农业及中国农业文化对外交流的开放姿态。“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及农业文化传播”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议题。

(一) 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

丝绸之路上的物种交流是农业交流重要的一部分,塔里木大学李鑫鑫副教授作了题为《欧亚种葡萄引种中国的若干历史问题探究》的报告,指出欧亚种葡萄约于公元前 6000 年首先被驯化和栽培于地中海东岸至高加索地区。随后,在青铜时代中晚期,主要经阿姆河流域向各地传播。虽然在青铜时期,由费尔干纳盆地到吐鲁番地域存在考古的缺环,但据其它考古资料以及相应的人群迁徙历史,推断欧亚种葡萄约在公元前 2 千纪末期通过欧亚草原与绿洲两条通道传入新疆。目前,吐鲁番盆地出土的战国欧亚种葡萄藤蔓、种籽是其传入中国最可靠的依据。

茶叶和芳香草药这样的经济作物的贸易与传播也是丝绸之路上农业交流的重要环节。福建社科院郭莉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福建茶叶从海上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传播研究》的报告,指出福建是中国茶重要的出口地,茶文化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福建茶随着丝绸之路传播世界,促进了东西方交流。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了福建茶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路径、茶马古道的形成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飞速发展。第二部分阐述了福建茶在欧洲的传播以及万里茶道的产生原因,特别提到闽南语中“茶”字的读音影响了世界各国“茶”字拼读。第三部分阐述了由于福建茶引领欧洲饮茶的风潮,茶叶的出口是导致西方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由此引发英国采取“鸦片贸易”扭转逆差。最终鸦片战争战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最后一部分阐述了福建茶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茶文化发展的观点。

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副研究员束成杰就《丝绸之路上芳香草药的传播和应用》作了报告,首先对芳香草药作了定义,然后介绍自汉唐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丝绸之路的芳香草药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物质和文化层面的传播,丰富了中医传统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期丝绸之路农作物传播情况及具体路线的考证,对丝绸之路农业交流的研究具有溯源的意义。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后徐定懿和吴昊的报告,分别讨论了汉代和北魏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这类讨论将丝绸之路上的农业交流的时间维度向纵深方向延展。徐定懿《西北边关地区屯戍对西汉麦作推广的影响》的报告分别从重回汉人视野的麦、边关汉简中的麦、麦粟之别、麦的适用范围四个方面论述了西汉边关屯戍对麦子传播的影响。西汉以前粟的地位远高于麦,古籍中关于粟的记载明显多于麦,麦因其食用口感等原因导致它被接纳的程度不高,粟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直到西汉时期因丝绸之路的开拓,西北屯戍的发展,养马和部队口粮需求的激增,西北气候更适合种麦且麦子的产量更高等原因,西汉以后麦子的地位便逐渐超越粟。

吴昊与中国人民大学西域语言研究所叶俊士博士《从〈宋云行纪〉线路看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的报告指出:《洛阳伽蓝记》卷五中记载了有关宋云、惠生等人的西使。法国汉学家沙畹整理此书并出版了《宋云行纪笺注》。书中记载了从中原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南线到达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地的交通线路,这是北魏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的东西交流线路。报告以交通线中的鄯善国、左末城、末城为例,结合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和佉卢文文书档案,并根据这三地的物种及农业状况记载进行考证,探讨中原与这三地之间的物种交流,进一步揭示西域诸国的社会生活状况以及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间交融的历史现象。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何红中副教授《中国北方黄河流域的粮食变迁》的报告,跨越不同历史时期,以黄河流域为研究范围,分别讨论了三种主要粮食作物黍、粟、小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和食用情况。报告重点从土壤、灌溉以及作物特性等角度分析了粟和小麦扩张的原因,体现了粮食变迁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密切关系。

(二) 丝绸之路上的农业文化传播

农业文化传播与农业交流密不可分,农业交流必然伴随着农业文化的传播。丝绸之路上的农业文化传播涉及沿途风土人情、经济与饮食文化等多个方面。剑桥大学丘奇教授(Sally K. Church)作了题为《耶律楚材诗歌中的十三世纪中亚印象》(Impressions of Early 13th Century Central Asia as Seen through the Poetry of “Yel ü Chucai”)的报告。报告介绍了耶律楚材的人物事迹,分析了他的诗歌作品,展现了13世纪初中亚的政治变化和风土人情。耶律楚材生于1190年,卒于1244年。他因受父亲影响而从政,热爱儒家文化。他匡佐蒙古的原因通常被认为是受到儒家兼济天下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自己能够制止成吉思汗的暴力,提出对被征服者应采取税收致富而不是屠杀的策略。报告还分析了他西部活动(1219-1227)的原因。最后作者重点介绍了耶律楚材的游记《西游录》和几首诗歌,其中涉及到很多的地名和当地的食物。报告用对图片和文字的解读,描绘了中亚地区当时的生产生活景象。

经济与文化传播向来关联紧密,丝绸之路上的经济一体化问题也是广义的农业文化交流的组成部分。广西师范大学乔柏教授作了《丝绸之路一体化和区域生产力的发展》的报告。报告首先说明区域生产力向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依存性和互补性,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第一部分阐述了区域生产力一体化的问题,分为:区域一体化的内在关系,布局优化问题和区域生产力的整合功能等三点。第二部分历史地回顾了进入21世纪后丝绸之路的发展,认为广西对21世纪丝绸之路具有重要作用;探讨了北部湾21世纪丝绸之路的理念与做法;介绍了广西21世纪丝绸之路的建设原则。第三部分介绍了东南亚地区区域生产一体化情况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基本联系。第四部分分析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北部湾区域一体化二者之间的结合与相互影响,认为区域生产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

饮食文化交流是农业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金相超博士《从饮食的角度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生态文化交流》的报告指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与西域地区已经形成了南北两大交通要道。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外饮食文化的交流。报告从香料、水果和蔬菜、饮食器具、医学等方面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交流,并说明这一时期的中外饮食文化交流是全方位的,同时指出了酒文化也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同样是饮食文化交流的报告还有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朱珠的《丝绸之路视域下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演变研究》。报告主要论述了丝绸之路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原材料、制作方法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影响,同时重点论述了当时的一批和饮食相关的文化典籍,如《四时食制》、《食经》、《食珍录》和《齐民要术》。其中《四时食制》(已佚)是我国第一部研究饮食的典籍。报告强调魏晋南北朝的饮食文化演变不是简单照搬的过程,而是在冲撞与融合中对本民族的饮食加以具有特色的改造。胡汉长期的杂相错居,并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最终趋于融合,形成了饮食文化的多样性特征。

二、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交流与比较研究

农业的交流并不局限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广泛的农业交流,而全球不同地区的农业,又因其相通性存在着可比较的空间。正因如此,“全球范围内的农业交流与比较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

造纸和养蚕是中国闻名于世的传统技艺,因此传统宣纸工艺和养蚕实践交流可以说是极为重要的农业交流。安徽财经大学曹天生教授探讨了《中日宣纸传统工艺演化的交流》问题。报告首先以宣纸为何物引出主题,介绍了制造宣纸的主要原料,展示了与宣纸有关的工艺品。随后对中日宣纸交流的相关研究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说明。接着介绍了宣纸技艺的发展分期,并指出日本曾对宣纸原产地大

肆破坏并盗走与宣纸相关的材料,这造成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对日本宣纸的仿制。最后阐述了日本对宣纸产业发展有积极影响也有破坏的观点。

西南大学李富强副教授作了《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湖州养蚕实践——基于〈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的研究》的报告。基于意大利人乔凡·巴蒂斯塔·卡斯特拉尼(G. B. Castellani)的《中国养蚕法:在湖州的实践与观察》一书及相关资料,报告讨论了1859年意大利探险队在中国湖州进行的养蚕实践、实践结果的传播以及该实践在中欧蚕学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卡斯特拉尼一行首次利用现代西方科学理论对湖州传统养蚕实践进行了相对系统的总结和评价。他们一方面已经开始使用温度计、显微镜等近代科学仪器以及近代实验科学的方法对家蚕生长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湖州养蚕方法的观察、验证、批判性继承则是现代西方科学意义上的实验。

不论是物种的对外输出还是外来物种的输入,都属于物种交流的范畴,物种交流是相当典型的农业交流。华南农业大学赵飞副教授对中国特有的水果荔枝的输出作了汇报。《乔治·魏特曼·格罗夫(George Weidman Groff)和他对岭南荔枝研究介绍》的报告指出:罗夫是第一个将中国荔枝传播到西方的人,其著作《荔枝与龙眼》详细介绍了广东荔枝的种类、广东的荔枝产地中心以及荔枝种植的古老方法。他的研究作为现代的荔枝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于帅博士则就辣椒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输入情况汇报了自己的研究,《辣椒的引进和传播以及其在西南地区的影响》首先介绍了辣椒传入中国西南的时间与路径,然后介绍了食辣的普及过程,辣椒的品种分类,最后介绍了辣椒加工方法,饮食方式的多样性等内容。

同样类似的物种输入研究还有南京农业大学陈明博士的《中国花生史的文献综述》。报告就花生名释考、花生在中国的引种与推广研究、花生本土化研究等方面做了综述。针对中国花生的起源是本土还是外来的进行探讨,基于现有资料搜集和整理,报告认为中国花生自美洲引入的观点占有优势。此外,报告还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方法做了汇报。拟采用自下而上和底层史学观来考察花生的发展,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方面进行研究,考察花生与传统社会的互动关系,希望能从医疗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文学寄托等方面进行分析。

南京农业大学胡文亮副教授《菠萝蜜在中国的引进、传播及种植原因》的报告也属于物种输入研究。报告认为人是作物生产和收获活动的主体部分,并在菠萝蜜的引进和推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开始,普通市民之间的物种交流是缓慢而渐进的。正因如此,菠萝蜜在萧梁时期引进中国后,种植范围没有扩大。中外交流的发展和市场扩张的要求,才使菠萝蜜被广泛种植在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和福建等地。这一漫长的过程,丰富了中国人民的饮食,见证了亚洲各国人民的交流,促进了物质、经济、文化的交流,还留下了许多充满神话意味的故事,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

除了中国物种对外输出和外来物种向中国的输入,世界范围内的物种传播研究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佳博士以《木薯在非洲新世界传播的一个初步研究》为题,汇报了研究成果。报告认为木薯在非洲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1600年-1800年、1800年-1900年、1900年至今。木薯能在非洲传播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自然环境、人口迁徙、自身优势、政府鼓励和贸易推动。木薯还具有能量高、生长迅速、产量高、抗虫害等优势。木薯在非洲的传播代替了非洲的原始农作物,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发展和雇佣贸易。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箭教授作了《新大陆玉米在欧洲的传播研究》的报告。报告主要观点是: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期间将美洲玉米带回了欧洲,开始试种与培育。之后玉米开始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的奥维多(G.F.de Ovideo)首次对玉米做了准确、系统、科学的描述。16世纪40年代德国的福克斯(Leonhard Fuchs)所著的《植物志》中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幅印刷出版的玉米植株全图。耐寒的玉米的推广渐渐消解了欧洲传统的冬季休耕制度,玉米粒和玉米秸秆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牧草成为饲料。但过度依赖玉米会引发佩拉格拉病,这种病直到20世纪初才消失。玉米在欧洲逐

渐发展为仅次于麦类(麦子)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支撑起近代以来欧洲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欧洲领先世界约三个世纪起了积极作用。

物种交流不限于粮食果蔬,家禽的物种输入也是物种交流的重要方面。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苏成爱教授就中国兔子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梳理。他关于《“中国本土兔子”的身份》的报告主要观点是:中国兔子起源问题纷繁复杂,欧洲起源理论和本土起源理论是这一问题的两大基本理论。“中国本土的兔子”和“喜马拉雅兔”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养殖的兔子,并且经常被看作是我国除了欧洲之外的另一个兔子起源地的证据。中国确实是世界上的兔子起源地之一,“喜马拉雅兔”也确是起源于中国,但“中国本土兔子”却并非起源于中国。根据可靠线索,可以得出“中国本土兔子”是1636年从海上丝绸之路引进而非中国本土物种的结论。

农书是农业文化的集成,农书研究是农业交流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南农业大学历史系魏露苓教授《〈元亨疗马集〉中的技巧与方法之我见》就是对农书的研究报告。《元亨疗马集》是介绍马、骆驼、牛三类家畜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专著,是喻氏兄弟多年医马医牛经验的结晶。它不仅继承了前人的兽医学成就,更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得来的实践经验。该书有着成熟的理论与技术,并准确、细致地区分了各类疾病,操作方法也很全面,图文并茂,易于学习掌握,是中兽医著作中的精品。喻氏兄弟根据自己的具体实践,利用经验积累法、试错法、移植法、逆向思维法等方法,解决了诸多具体问题。这是《元亨疗马集》在方法论上的成功之处。

李约瑟是著名的科技史专家,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科技都有重要研究。剑桥大学李约瑟图书馆馆长约翰·P·C·墨菲特(John P. C. Moffett)先生作了《东亚科技史图书馆的发展情况》(Event development at 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Library)的报告。墨菲特先生首先对李约瑟做了详细的介绍,包括每次访问中国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事件,展示了丰富的图片和李约瑟日记等档案资料;其次介绍了李约瑟研究所的成立原因和目的,目前的工作人员、访问学者和奖学金的设立情况;最后重点介绍了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尤其是善本目录和图录,还分享了《橘录》三卷、《天工开物》三卷、《农书》二十二卷等珍贵善本资料的图片。

灾害研究是农业史研究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与美国在对抗蝗灾措施上虽有相异之处,但在相同时期内也存在着相似性,因此对中美蝗灾应对措施的比较是相当有现实意义的农业比较研究。华南农业大学赵艳萍副教授《危机与应对:十九世纪中美大蝗灾之比较》报告比较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与北美大陆几乎同时经历的蝗灾情况,讨论了蝗灾的发生原因和影响、捕治技术和社会应对等方面的内容,得出两国的蝗灾无论是从技术史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史角度都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报告随后也阐述了不同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下应对灾害的差异方面。

三、地理环境、气候与粮食问题及对亚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

PNJCCS即“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创建于2014年,双方商定每年轮流承办一次关于中国研究的学术论坛。本次论坛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召开。美国普渡大学作为联合主办单位,其学者对全球范围的地理环境、气候与粮食问题以及对亚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都极为关注,同时中国学者也关注了相关问题。因此,“地理环境、气候与粮食问题及对亚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议题为本次研讨会注入了国际化的因素。

(一)地理环境、气候与粮食问题

对地理环境的考察不但有利于我们了解过去,同时还有助于我们对现有资源开展合理的利用。美国俄勒冈州大学地理学院的约翰内森(Carl Johannessen)教授就《干石建筑的传播》(Diffusion of Dry

Stone Architecture)的问题作了报告。报告首先列举了世界各地的干石结构建筑之间的密切相似之处。由于海洋的阻隔,如果处于不同大陆的人们没有互相交流过相关的建筑方法和技术的信息,就无法完成相似的干石建筑的创造。报告根据此一充分证据,证明世界各地之间的跨洋接触导于大航海时代。那些跨洋的贸易商与水手之间相互交流,将许多技术共享给其他地域的人们。世界各地的植物、动物以及疾病的相似性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

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考克莱尼斯(Peter Coclanis)教授则在报告中主要讨论了澜沧江—湄公河的水电资源和水电治理政策(Hydropower, Hydro politics: Governing the Lancang-Mekong)。这样的讨论对我们合理利用现有水利资源具有积极意义。

对气候问题的探讨同对地理环境的考察一样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并从中总结出客观规律。南京大学贾鑫副教授作了题为《中世纪暖期人类是如何在东部农牧区适应》的报告。报告以历史上竹子生长地区的变化为例,发现在中世纪暖期(辽代)年气温和降水量呈递增趋势。这种气候环境的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饲养业的发展和狩猎物数量的增长,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大量食物,积极影响了辽代的国土扩张。报告得出结论:当畜牧业逐步被农业所取代,社会机制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温暖而潮湿的适宜气候下,人类文明会得到扩张。

粮食问题一直都是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中美学者分别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消费与农业劳动生产力和非农产业分离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相关粮食问题。这样直指当下社会现象的探讨对现实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指导价值。普渡大学戴维斯(Frederick Rowe Davis)教授讨论了《美国与中国杀虫剂的今昔》(Pestici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ast and Present)这一问题。报告指出绝大多数现代杀虫剂包含 DDT 或有机磷酸盐,它们都对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危害。《寂寞的春天》出版发行 10 年后(1972 年),美国禁止使用 DDT。环境保护运动虽取得初步胜利,但形势仍然严峻。中国政府在 1983 年禁止了 DDT 和 HCH 的使用,但其他的农药年使用量仍然持续上升,造成的中毒人数和死亡率居高不下,食品安全和环境保护前景堪忧。

南京师范大学郭爱民教授做了《中国粮食作物生产和消费与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分离》的报告。报告首先讨论了农业劳动生产力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庞卓恒运用马克思的观点提出了解释农业与非农领域分离元素模型。根据政府统计,作者提出等式: $Agr=N/S$, $Nagr=1-N/S$ 。然后对中国 1950 年以来农业劳动生产力做了动态计算。1950—2010 年期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谷物消费表现出的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80 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停滞状态。谷物消耗主要取决于谷物产量的低量值。第二阶段,1985—2000 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第三阶段,2000—2010 年间,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最后,作者通过来自中国,日本,美国 and 韩国的相关数据表明,在粮食进口比例较小的前提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是农业和非农产业分离的基础。在日本和韩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似乎很高,但这两个国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粮食,这就产生了效率幻觉的现象,产业分化不是由这种现象引起的。相反,在中国和美国,由于进口的收益比例相对较小,产业分离的动力来自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二)对亚洲与中国问题的研究

普渡大学相当多的学者对亚洲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以及美国国内的亚裔问题相当关注,他们分别从女性主义、经济史以及种族问题等角度展开了自己的讨论。普渡大学黑斯廷教授(Sally Ann Hastings)以《国际的基督教、日本与中国:以河井道(1877—1953)为例》(International Christianity, Japan, and China: The Case of Kawai Michi, 1877—1953)为题作了报告。报告分析了基督教在中国和日本的传播,及其对女性的影响。报告以“世界女性基督教协会”(YWCA)为例,特别介绍了日本 YWCA 的领袖河井道女士。报告认为 YWCA 对缓解二战期间的尖锐矛盾,帮助女性获得生存技能等各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普渡大学蒂尔曼助理教授(Margaret Mih Tillman)的报告讨论了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的保育和动员保育的情况。作者以中西方在儿童看管问题上的差异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原因和症结,认同当时保育院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报告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档案记载,呈现了那一时期儿童学习和生活的场景,肯定了妇联的工作和广大女性劳动力的作用。最后报告分析了当时集中资金人力的教育模式产生的利弊和长远影响。

经济史研究对还原史实具有重要的意义,普渡大学艾金森助理教授(David Christopher Atkinson)的报告讨论了 1900–1929 年美国汽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让我们对此间的历史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普渡大学张瑞胜博士作了《壮志未酬: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农村(1934–1944)》的报告。报告指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 1913 年建立开始,洛克菲勒家族就对中国的慈善事业怀有一套明确的目标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为了解决当时日益凸显的中国农村问题并尝试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洛克菲勒基金会理事委员会在 1934 年批准了第一个中国农村综合建设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发展现代化中国农村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连年战乱、政局不稳定以及资金短缺皆阻碍了其雄心壮志。1944 年基金会结束了在中国大陆的农村项目并于 1949 年从中国大陆撤离,但他们对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影响至今仍广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

美国华裔等少数民族裔的问题,也被普渡大学学者所关注。加仑教授(Kim Teresa Gallon)的报告以报纸《匹兹堡快递》1943 年全年的新闻报道及评论为素材,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华人与美国黑人之间的关系,还原了美国华人及美国黑人为了自由而战的决心以及逐步取得胜利的过程。

与美国学者的关注点不同,中国学者更加关注农业教育问题。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施威副教授作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变迁轨迹、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的报告,重点探讨了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变迁的背景与动因、演进轨迹、变迁模式及其特征及其变迁实现机制。从总体上看,变革过程表现为一种基于被动性、非计划性的渐进方式。这种变革既是一个引进外国经验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努力加强与“三农”结合的过程,充分体现了高等农业教育“辅助农民,改良农业,发展农村”的宗旨。然而,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制度变迁因为守旧势力阻挠、改革成本高昂;缺乏统一而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等原因导致这种变迁是曲折、缓慢而低效的。

南京农业大学石松副教授则在他的报告中讲述了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在植物育种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报告回顾了布里尔(G.D.Brill),洛夫(Harry Houser Love),约翰·雷斯纳(John Henry Reisner)等人做出的贡献,并指出康奈尔大学与金陵大学的交流与合作是一个双赢的项目。

“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学术研讨会:2017PNJCCS 论坛”成功召开,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三大议题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体现了论坛立足丝绸之路农业传播,面向世界文化交流的主题特点。丝绸之路的相关研究是当下的一个热点,农业又一向都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是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在这样的历史当口,“丝绸之路与中外农业交流学术研讨会”的学术讨论既是对社会热点的回应,同时更具有深化南京农业大学中外学术交流对话,促进科学技术史学科的交叉研究与有力提升的深远意义。我们相信,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与普渡大学的默契合作之下,将来的 PNJCCS 论坛还会继续大放异彩。